“郑学”四论

黄孝德

在汉学史上,郑玄(公元127—200年)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是“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李诒语)的伟大学者。其学“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①,后人称为“郑学”。郑学主要成就在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本文拟就郑学的渊源、特色、成就、问题,作点概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郑学的渊源

训诂学作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枝,它的发生、发展,是和文献学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传统语言学就是文献语言学,是以书面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这里的“文献”,指历代的传说和文字历史资料。博学多闻的孔子能言夏、殷时代的典章文物制度,但他慨叹文献不足,有许多情况还谈不清楚。今天,我们比孔子所处时代较好一些。夏朝是传说时代,可资凭信的史料缺乏,但殷商时期的文献已有实物出土,从甲骨、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周代的文献就更多了,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足资考证的文献为数众多,门类齐全。自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作《易传》以来,文献的整理逐渐被人重视。但那时还处于各国争霸局面,全国性的文献整理尚不可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使文化遗产受到摧残。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别是汉武帝时,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使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居当时世界的前列。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献学和训诂学在两汉期间,都进入了兴盛时期。

文献学和训诂学在两汉的兴盛,又是和经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当时,正处秦火之后,许多古籍流散民间,加上隶书通行,一般人看不懂古书,需要整理和注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深了人们对整理古代文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一个以整理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整理古籍的热潮,很快就在两汉兴盛起来。其集中的成果,就是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七略》收集综合了西周至汉代以来的重要文献,它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不亚于《史记》在历史上的价值。《别录》和《七略》,后都已亡佚,但班固曾据以写《汉书·艺文志》,我们还可从中窥见其梗概和规模。

两汉的经学和训诂学,都是在当时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展开的。而两汉经学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给予训诂学和文献学的影响又特别深远。这从郑玄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郑玄少为乡间小吏(乡啬夫),后入太学受业,主要学习今文经学。后来,“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广泛接触各派学说。33岁以后,又由卢植引见,从师古文经大师马融,终于学通今文经和古文经,并有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坚实基础,为他后来遍注群经、综论今古文作了准备。郑玄学成归里,聚徒讲学,门徒相随数百千人。后遭党锢之祸,“十四年而蒙赦令”(见《戒子书》)。45岁以后,才隐居修业,杜门不出,专心著述,并与当时今文经学著名学者何休展开辩论。郑玄入室操戈,使何休无还

架之力。

汉代的古文经学，在刘歆之后，一直受到今文经学的反对。东汉时期，范升、陈元、李膺、贾逵等争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达到白热化程度。到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郑玄批判何休，并遍注群经，才真正据通深，使古文经学大明于世。郑学渊源有自，影响深远。要真正了解郑学，就要总结这一段历史、弄清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的关系，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二、郑学的特色

郑学是通人之学，其特色是：

(一) 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不守门户之见，自创家法，建立自己的经学体系。

在汉代，由于统治阶级独尊儒术，儒家经典的注释大批出现。据《汉书·艺文志》和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关儒家经典的注释将近二百种，其中，以今文经说为主，也有一批古文经说。在那今文经说极盛的时代，郑玄以经学改革派的勇气，一反时俗之见，而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建立自己的经学体系：“于《易》先通京氏，后传费氏；于《书》传杜林古文；于《诗》先通韩氏，后尊毛氏；于《礼经》本传小戴今文之学，兼习淹中古文；《周礼》采杜子春及二郑（郑兴、郑众）；《礼记》依卢、（植）、马（融）之本；《春秋》则有评论略说，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谷梁废疾》；其余《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有注解，由其于两汉经师之说，综括靡遗，而又网罗百家，博稽六艺，证其同异，辨其是非。”^②在郑玄之前，两汉经说，各守师法，壁垒森严，鲜有会通。郑玄遍注群经，使两汉古、今文之争终于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决，这在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史上，都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改革。郑玄注古文费氏《易》而今文施、孟、梁三家《易》废；注《古文尚书》而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佚；笺古文《毛诗》而今文齐、鲁、韩三家《诗》不显。学术上的竞争，也往往是优胜劣败。历史的选择，充分肯定了郑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二)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训诂

西汉经学，博士大都专攻一经，兼通数经者，除韩婴、申培、后苍、孟卿、胶东庸生等数人之外，几无他人。至东汉，兼通数经者渐渐增多。郑玄博通今文经和古文经，除遍注群经外，还有“论”（如《六艺论》、《七政论》）；“谱”（如《毛诗谱》）；“议”（如《禘祫议》）；“驳”（如《驳许慎〈五经异义〉》）；“难”（如《答临孝存周礼难》）；“发”（如《发〈公羊墨守〉》）；“针”（如《针〈左氏膏肓〉》）；“起”（如《起〈谷梁废疾〉》）等多种训诂体式，这就使训诂的形式更加灵活，训释的内容更加广泛。

(三) 简约

在郑玄之前，博士说经，往往繁琐寡要。郑玄博洽经传，长于训诂，遍注群经，使儒家经典有了能为后学所取正的注释。宋代朱熹对这一点十分欣赏，他说：“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朱熹所述汉儒，主要指郑玄。

三、郑学的成就

郑玄注释，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等众多学科，其成就是多方面的。若从训诂角度考查，概括言之，不外存古义、明古音、通百科三个内容。

存古义。就是在注释中，重视古今词义的对比研究，强调以今语解释古语，使古代文献词语的本来用法得到合理解释。以今释古，本是先秦训诂常例，并非郑玄独创。但到汉代，郑玄遍注群经，这一训诂原则才得以应用在各个方面，使其产生极大影响。这在现存郑玄笺注中例子极多。如《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郑玄笺：“允，信；展，诚也。大成谓致太平也。”以“信”释“允”；以“诚”释“展”，皆以今释古。为了存古义，郑玄笺注还十分重视用复音词训释单音词。如《诗·小雅·南有嘉鱼》：“烝然汕汕。”毛传：“汕汕，櫟也。”郑玄笺：“櫟者，今之噍罟也。”孔颖达疏引孙炎曰：“今之噍罟，皆以今晓古。”又《论语·子张》：“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郑玄注：“厉，严正也。”以复音词解释单音词，不仅缩小了词义范

围，而且使古代文献词义解释得更加明确。先秦语言中单音词比例较大，汉以后复音词比例上升，郑玄遍注群经，几乎用尽了当时常用的单音词和复音词，集中反映了当时词语变化的情况。如果将郑注中这方面的资料收集起，对比汉代其它文献中的用词情况，编一部汉代断代词典，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明古音。是在注释中尽量说明古代文献中在词语方面所保存的古今音变的轨迹。郑玄深知古今语音随时间、地域的转移而不断变化的道理。《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音异字，同字异言，於兹遂生。”这就指明了一条训诂通例，开以后说明古音通假的先河。郑玄笺注中，因声求义，说明通假的例子极多，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毛传：“甫，大也。”郑玄笺：“甫草，圃田之草。”郑玄的意思是，“甫草”中的“甫”，是假借字，即借“甫”为“圃”，“甫草”不是“大草”，而是“圃田之草”。郑玄笺注中说明古今音变的材料极多，后来训诂家多据以研究先秦两汉的古音古义，这是一分十分宝贵的历史信息资料。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云：“大人曰：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诂屈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说：“故大人（指王念孙）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清代汉学兴盛，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正是沿着郑玄开辟的路子，吸收历代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古音系统，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的研究，从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通百科。就是通过注释，广泛解释属于百科性的语词意义。郑玄注释，以《三礼》注为代表。唐代孔颖达说：“《礼》是郑学。”^③这话很能说明《三礼》注在郑学中的地位。《三礼》是有关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方面的百科全书。《论语·为政》：“齐之以礼”朱熹注：“礼谓制度品节也。”所谓制度品节，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当时的人对当时生活资料分配所持有的态度。由于时代已经变化，《三礼》的基本思想，当然已经过时。但作为历史资料，在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等古史方面，它仍然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郑玄在《三礼》注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百科词目的解释，仍然是我们了解前代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桥梁。事实上，郑玄遍注群经（包括《三礼》注）的成果，在郑玄以后各代注释中，早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书籍的注释。如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凡《史记》文与伏生《尚书》同者或与《三礼》、《论语》、《孝经》同者，其注释皆首先采用郑注。^④后代辞书编纂，有关古代文物制度等百科词目的释义，也多参考郑注以成说，如今之《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等。清代顾炎武说：“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⑤从某种意义上讲，顾炎武的话，在今天也还没有过时。

四、郑学研究中的问题

郑学是两汉经学中今文经和古文经互相矛盾、斗争的产物，也是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发展到汉代末年许多问题上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对不对？近二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 古文经是否可靠的问题

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从材料出发的，如果所据材料不可靠，就根本无法肯定这项科研成果的价值。

汉代出土的古文经是否可靠呢？这是文献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包括经学史、训诂学史和整个文化史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郑玄是古文经学大师，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批古文经和建立在这批古文经上的两汉古文经说。因此，研究这一批古文经书的真伪，就成了如何评价郑学得失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要追溯到汉代古、今文之争。汉代抢救遗产，整理古籍，当时，朝廷多次下诏求遗书，结果，“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文选》注三十八引刘歆《七略》语）。当时，收集到的包括儒家《诗》、《书》、《易》、《礼》、《春秋》在内的古籍，绝大多数是用隶书写成的（《诗》、《书》则是由学者口授，用隶书记录下来的）。当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的经说，都是根据隶书的本子而编制的，这就是汉代

的今文经学。汉武帝太始四(公元前93)年,鲁恭王扩建孔子住宅,折毁了一所孔子住过的旧房子,从夹壁中得到了用古文写的《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书,这叫孔壁古文经。此外,还有北平侯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所献《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以及鲁淹中出土的《礼古经》等(皆见《汉书·艺文志》)。孔壁古文经是由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出来的,据说他能看懂古文,曾奉诏为《古文尚书》作传,他还写了《古文孝经传》和《论语训解》,有不少人跟他学习。《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早已亡逸,今存《尚书》孔安国传,据清人考证是东晋梅賾托伪而作,故称《伪孔传》。这批孔壁古文经和河间献王等献的古文经,后来又经刘向、刘歆与今文经校勘整理,写成定本,也有不少人从事研究,写出一些注释,在民间流传。这就是西汉早期的古文经学。

从历史记载看,古文经和今文经,在汉代初年都已相继出现,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汉代初年成书的《淮南子》是一部杂家的著作,其书成于武帝以前的景帝时代,其时,儒家尚未独尊,更未发生古、今文之争。《淮南子》中称引《五经》就杂取今文经和古文经^⑥。后来只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今文经被列学官,占据统治地位罢了。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歆仕莽,拜为国师,他利用手中权力,把古文经说列入学官,两汉今、古文经之间才爆发一场大辩论。整个东汉,古、今文之争一直绵延不断。争论的实质,是由那一种经说来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周礼》这部书上。今文经学派认为《周礼》不可信,是出于刘歆伪托。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可信,它是“三代虽亡,治法犹存”(语出《荀子·荣辱篇》)的见证。

为什么《周礼》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刘歆曾以《周礼》为理论根据,帮助王莽改制,篡夺汉家天下,在今文学家看来,它是刘歆十恶不赦的罪证;二是《周礼》这部书来路确有可疑,可能在刘歆整理时加进了一些内容,这就成了今文学家反对古文经说的把柄。今文学家攻击刘歆“颠倒五经”,说古文经全是刘歆“臆造”的一些假古董,想从根本上打倒古文经学。

其实,从历史的记载看,《周礼》这部书作为先秦古籍基本上是可信的。《周礼》又叫《周官》,又叫《周官经》。据说汉文帝曾得魏乐公书,就是《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汉武帝议封禅,群臣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见《史记·封禅书》),也提到《周官》这部书。河间献王曾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而作《乐记》。《隋书·经籍志》说:“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这些事,都发生在刘歆写《七略》之前,更在刘歆仕莽之前。又有人说,《周官》即《尚书》的周官,根本没有这部书。东汉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都反对这种说法。马、郑的根据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有《周官经》六篇。

问题在于,《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写成的,可能《七略》就叫《周官经》,班固只是沿用其名目。然而,王莽居摄三(公元前8)年九月,刘歆为羲和,与博士诸儒议,“发得《周礼》,以明殷鉴”(见《王莽传》),又把这部书叫做《周礼》。《周礼》是不是《周官经》呢?这里又生矛盾。但在古文家看来,它是同书而异名,是没有疑问的。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就说:“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奏以为《礼经》置博士。”这恐怕是当时古文经学家的共同看法。

两汉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以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以郑玄综合古今、兼采讖纬遍注群经而告终。它宣布了古文经在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上的价值。

但是,古文经的疑信问题并没有因此停止争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整个儒学都受到怀疑,古文经也在其中之列。

唐代儒学复兴,唐人所编《九经正义》中,《诗》取毛传郑笺、《三礼》取郑注,古文经及汉人的古人经说又大受尊信。

宋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性之学盛行,他们一反汉唐传统,开展了对古文经学的批判。宋人疑古之风盛行,刘敞(字原父)撰《七经小传》和《春秋权衡》,摆脱传统束缚,开宋人批评汉儒的先声。之后,“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顾命》非周公所制礼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传》非左氏书者;有疑《孝经》为六代后增改非七十子所旧传者。”^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整个古文经学都遭到怀疑。这些怀疑,不一定全对,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无启发作用。

在清代,由于经学的复兴,古文经又被尊为正统,被许多人钻研、玩味,许多有用之才,都为之消磨

终身，乐以忘忧。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经学，自标“博学好古”，凡汉儒旧说，一一搜寻，大量辑逸。其中，有关郑玄的资料，在袁钧《郑氏佚书》、黄奭《高密遗书》、孔广森《通德遗书所见录》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逸书》中，皆有辑逸，为我们提供研究郑学的资料带来了方便。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经学，则采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态度，把经学和考据学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我国从汉代以来的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目录学的成果，他们相信古文经，但也做了一些辨伪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根据历史资料进行古史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但这一派人信古太过，多半只是做些注疏方面的工作，理论的概括则严重不足。他们以经学为天下最大的学问，又往往有食古不化之弊。

在清代经学中，亦曾发生过古文经和今文经之争。当皖派、吴派经学独霸学术讲坛时，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开展了对古文经学的批判。龚自珍反对古文家脱离政治，专搞考证，而主张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改革。魏源作《书古微》、《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力主今文经说和宋元理学，批判古文经。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亦倡导今文经学。康有为作《新经伪学考》，认为一切古文经书，全出刘歆伪造，对它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又作《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宣传托古改制思想。作《大同书》，以《礼记·礼运》的思想为主，混杂一些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马托邦式的“大同世界”。这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批判古文经学，赞成今文经学，是想把经学变成他们改制的工具，为建立资产阶级统治服务。

清代的今文经学运动，以戊戌政变的失败而告终。

清代的古文经学也因民国的建立而失去政治依靠逐渐走向衰落。

五四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反对尊孔读经的口号，古文经学曾受到严厉批判。在古文经学声名狼籍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学习和传授，章太炎、黄侃就是代表，他们对古文经始终尊信不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古文经真伪问题的论争，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这场论争长达一千多年，涉及许多史料的重新整理和评估，情况十分复杂，在今天的郑学研究中。它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古文经说中的封建思想问题

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经学，一直是封建统治者用以实现其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工具。郑玄生在汉末，身处绝续之际，以其博闻广见，总集其成，在儒家经学的形成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正如清代孙星衍所说：“或以前代置《五经》博士，重在道统，不知道存乎经，统本于尧、舜、禹、汤、文、武。伏生不传《尚书》，则道何所存？统何由述？东晋板盈，经师失传，诸经之义，岂能臆说？赖郑康成集汉儒之大成。经义无康成，则渊源中绝，唐、宋诸儒何由复知道统？”^⑧翻开二十五史，就可以看到，历代统治者对郑玄的预礼谩拜，始终不绝，就可以知道郑学在整个经学传播中的地位和影响。郑玄被称为“纯儒”，正是对他传播最纯正的封建统治思想所作的确切评价。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观念还顽固地束缚人们的手足。我们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已经进行几十年，封建制度也已被推翻。但制度的变革，并不等于旧思想的消亡。直到目前为止，在有些人的头脑中，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新思想，什么是封建阶级的旧思想，还不是十分清楚的。在思想战线上，清除封建思想的余毒，还大有文章可做。在这个时候，我们展开对于郑学的研究，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注释：

① 见《后汉书·郑玄传》引《戒子益恩书》。

② [清]胡培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大柳堂记》。

③ 见《礼记》中《月令》、《杂记》诸篇孔疏。

④ 见《史记正义·论注例》。

⑤ 顾炎武《述古》。

⑥ 曹道衡《〈淮南子〉和〈五经〉》一文有详细分析。见《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7期。

⑦ 毛奇龄《经义考·序》。

⑧ 孙星衍《咨请会奏置立伏、郑博士稿》。